

为人父母后的艰难与美好

班超编译



有时候,我和妻子凯伦会说起孩子出生前的生活。那时,我们的钱更富余、睡眠更充足、时间更灵活、情绪更平和,也没有这么多的白发。

6年前,随着我们的大儿子海登的到来,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可以说,是突然之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某种程度上都变了。总的说来,是变得困难了。

吃饭难了。我们不得不考虑更健康的选择,以鼓励一家人吃得更好,帮助孩子建立习惯,消除儿童肥胖。饭后,更是一团乱!

娱乐难了。我们再不能因为一时兴起,就轻松地跑去打球或看电影了。我们需要考虑临时保姆与孩子们睡觉的时间,见缝插针地娱乐。但通常的情况是,我们放弃了,只坐在家中的沙发上看DVD。

度假难了。我们梦想的假期,已经从异国情调的海外旅行(昂贵的价格、20多小时的飞行,外加3个孩子),变成了在本地海滩呆几天。即便如此,我们的梦想也没能实现。

购物难了。从家出发去商场,简直是一次军事行动。给孩子穿衣服、包好尿布,把每个孩子都放进车里、坐好,同时你得考虑午睡时间、零食时间,以及我们的小宝贝最可能在拥挤的百货商场暴跳如雷的时间!

但在所有的挑战和混乱中间,还有其他时刻——那些让一切变得值得的时刻:

我们3岁的儿子洛根,告诉我妻子她有多漂亮时;

尽管我们6岁的儿子海登一年多来都是球场上最小的队员,他踢球的热情和喜悦却丝毫不减;

我们3岁的女儿唱着自编的新歌跳着自编的热舞,给我们表演时;

有个孩子在下棋时把我打败了,他们的取胜使我们不由发自内心地自豪微笑(尽管他们得到了悄悄的帮助);

每个孩子都按我们教给她的一个重要原则做事的时候;

每个孩子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迈出了一步时,无论这一步多小或多大;

3个孩子一起玩得那么好,以及一个受伤时其他人表达关心的时候;

孩子们不断地成长,变得越来越独立,使生活的某些方面更容易的时候。

对父母来说,挑战在于找准关注点。

如果只关注更难的方面,我们最终会抱怨不休,对孩子形成一个消极心态的熏染。当我们垂头丧气、愁眉苦脸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时,总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会注意到。这会影响到他们与我们的交流,并可能损伤他们的自尊。

如果去关注美好时刻,我们会为孩子和他们的成绩骄傲。我们会试图寻找途径表扬孩子,与孩子积极地互动。房子将更像一个游乐场,而不是战场才更容易培养出适应力强、乐观向上的孩子。

当为人父或为人母以后,一切都变得更艰难了,但一切也都变得更更好了。当有了孩子,我相信生活有更多的意义,这一生更值得活了,而且,有了更多的机会给予和接受爱。

我每年都要给美国连锁式便利商店集团进行管理培训,培训项目中有一项是如何留住高素质的员工,在与学员讨论时,我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使你一直留在该公司而成为了经理的?”

有一位经理说:“一副19美元的棒球手套。”

大家都好奇地看着她,等着她继续说下去:“其实,我在售客开商店集团找工作时只是抱着过渡的心里,等到找到好些的工作我就立马离开。大概是站柜台的第三天吧,我接到九岁儿子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儿子说他要一副棒球手套才能参加少年棒球联合会。”

她顿了顿,继续说:“我是个单亲妈妈,手头很紧,拿到的工资得先支付帐单,剩下的已没有多少了,还

要糊口。第二天,我上班后,商店经理叫我到他的办公室,我想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了,或是昨天哪些事情没有做完,我忐忑不安地来到经理的办公室,经理递给我一只盒子,说:“我昨天碰巧听到你和你儿子的谈话,有些事情我们是很难跟小孩子解释清楚的,这是一副棒球手套,是你儿子需要的,你知道,我们店不能付给像你这样的高素质员工很高的工资,但是我们很看重高素质员工,我们要让你知道你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听着经理的话,手捧着那副手套,我感动得差点流下了眼泪。从此我就在公司呆下来了。”

管理者对员工的体贴与关爱有时要比高额的工资更能打动员工。



夏建清编译

一副棒球手套的价值

舞动的归属感

(美国)米丝蒂·科普兰 陈荣生编译

我上的第一堂芭蕾舞课是在一个篮球场上。

我母亲是单身母亲,我是她6个孩子中的一个,我们面临着很多挑战——频繁搬家、更换学校,我变成了一个非常内向的孩子。我学会了闭上嘴巴,以避免其他孩子的批评。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融入社会,我从未觉得自己属于哪里。

最初的几节芭蕾舞课也还是在篮球场上。

过的音乐,而且有一位教练摆布着我的身体把它摆成不同的姿势。更不用说我是班上唯一一个没有穿连身紧身衣和芭蕾舞鞋的人,我穿着T恤、短裤和袜子。我还记得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不,这不属于我,我不适合,我不属于这里。”

然而,一两个星期过后,我的教练老师给了我全额奖学金去她的学校接受训练。我母亲同意我去,于是我继父带我去当地的芭蕾舞用品店。我记得第一次穿上连身紧身衣时,立刻就感觉到它们像是我的第二层皮肤。它们很适合我,我也很适合它们,这就是我的归宿。

几年后,作为纽约美国芭蕾舞剧院的独舞演员,在《火鸟》芭蕾舞剧演出的那天晚上,我的一切都改变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晚上,那是一个差点就不会出现的夜晚,因为我把一个很严重的伤掩盖起来了,我知道如果艺术总监和理疗师知道我的疼痛的严重程度,他们就不会允许我去表演了。但我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的票都售罄了,而且我知道一半以上的观众都是黑人和有色人种,这在大都会歌剧院以前从未发生过。我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第一次来。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归属感的人,我知道那天晚上的演出对我有多么重要。我告诉自己:“即使这是我在舞台上表演的最后一晚,这也将会对芭

蕾舞界,对我在芭蕾舞界的群体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记得,我那是第一次走上舞台,尽管我所看到的是一片黑色的海洋,但我能感受到那股能量。观众的欢呼声是那么响亮,持续时间是那么久,让我都听不到乐队演奏的声音了。我心想:“我不知道我是否对上音乐,但我要继续表演下去,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从观众身上感受到的骄傲、爱和能量是显而易见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了。

这是我在那个大都会歌剧院演出季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演出《火鸟》。第二天,我告诉艺术总监我受伤了,一段时间后我接受了手术,几个月后我才恢复过来,回到舞台上。但这太值得了。

在《火鸟》演出的那个晚上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我站在了舞台之上。这是我代表了所有那些没有机会做我所做的事情的了不起的黑人女性。是各个领域的黑人妇女为我铺平了道路,我才有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我现在知道了,我的目标不仅仅是跳芭蕾舞——这个曾经不敢说话的孩子,现在可以代表那许许多多的感觉没有归属感的人了。

(译注:米丝蒂·科普兰, Misty Copeland, 美国有影响力的女性,著名的美国芭蕾舞剧院的第一位非洲裔首席舞者。)

(题有改动)编者



你必须内心丰富,才能摆脱生活表面的相似。

于昌伟

这门课是当地的学生俱乐部免费提供的,是为像我这样的孩子设计的——他们是各种各样的学生,否则他们可能没有机会或途径成为芭蕾舞世界的一部分。

我还记得,我一走进体育馆,走进篮球场,立刻就感觉很不自在。13岁的年龄,对芭蕾舞世界来说已经是老人了,而我来了,被推进到这个对我来说很陌生的课程,听着我从来没有听